

红色记忆

烽火岁月
锦书传情

刘晓芬

彭雪枫（1907-1944），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军团第13团长、红1军团第4师政委、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等。1936年，彭雪枫受毛泽东同志之命，秘密来到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做了大量“先行”、保障工作。1941年9月，彭雪枫与妻子林颖结婚。婚后三天，二人即各自奔赴工作岗位。直到彭雪枫牺牲，两人朝夕相处的时间不足半年。其间主要通过信件沟通交流。这些家书情真意切、言辞之善、文笔之美，读来让人感动，引人深思，更让人受益匪浅，也足见彭雪枫在政治修养、人格品德、文化素养、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水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彭雪枫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他给林颖的第一封信写于1941年9月4日。“我心中的同志，她的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的（今天为“地”，下同编者注）了解我，才能更多的（地）帮助我，也才能更多的（地）互相帮助。”彭雪枫拥有谦虚上进的思想态度，坚定的党性立场：“相信，我们的胜利信心是坚定的，是不可拔的！是任何煽动都动摇不了的。”

彭雪枫对爱人和党都充满了爱：“我所期望的颖，是热爱着你的爱人而同时又更热爱党”“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

彭雪枫要求妻子批评督促他，“颖，我说的是你呀，在对我的学习上，党性锻炼上，待人接物上，领导方式上，应该‘主动’的（地）帮助我，你不能假想我会比谁更完整些，只需我批评你，而不需要你批评我，在这一方面，我恳切希望，你能更坚强些，更直接些，更主动些……”

彭雪枫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如何面对各种批评和舆论，他作了十分透彻的阐述分析，“你要一百二十分的（地）下一番克己功夫！先苛责自己，别抱怨人家！任何人（连水平最低的人在在）①，对你的批评，不管是当面的或背地里（背地里的批评是所谓舆论）②你都必须以……虔诚态度，先来自我反省一番。……我们不应为舆论所左右，然而也不能过于漠视舆论！”他言辞温和而坚定，真诚、善意溢于文字之间。

彭雪枫酷爱读书，还将所学知识转化，经常写文章发表，作报告，他给妻子的几乎每封信都会提到自己读书的情况、收获或感受，以及下一步的读书计划，并且鼓励督促妻子读书，共同进步。“带去之书，读了几本了？鲁迅的文章简洁深刻，极有骨气，多读不仅在文字之技巧上有益处，更可加强自己之修养。”“送你的书，看了没有？作笔记了没有？党是如何的注意着干部们的学习问题，远离上级和远离我的你，相信在学习上是会刻苦的，希望不久后，见到你的成绩。”“不要以为书多，翻了这本丢了那本，硬着头皮，攻完一部再攻其他，读书是要有一种像出兵进攻敌人那样精神才行的，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胜利！”

“能真诚爱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的爱护。”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彭雪枫悟出了真谛。

“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才能永才能长，夫妇相敬如宾，然后也才能永才能长！这里头包含着哲理的，你品品它的滋味。”更进一步，他通过看曹禺《日出》，分析主人公陈白露的经验之谈，“他们为什么厌烦以至于终于离了呢……就是说他们没有一致的思想，也就不不会有一致的行动，他们的爱缺乏也可以说根本没有‘政治基础’，所以思想上的一致，政治上的团结，才是共产党人恋爱的有力保证……”然而，做到信念一致、价值观一致还不够，夫妻之间“相互理解（不仅是了解而已）③共同进步便成为必需的了。”理解与进步‘即时时现出新鲜，新鲜便愈益情浓。进步在于双方不停止的（地）力求学习，理解即在双方采取‘理性的认识’，而‘史的探讨’则更有助于双方的理解。”就是说，理解的基础是双方对对方过去生活的了解，所以“我有义务帮助你更多的（地）了解我的一切，以便你更好的（地）理解我的一切……”

与人交往时，彭雪枫“始终没有忘记过一次”毛主席告诫他的“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既交友了，又怕人家存戒心，不易接近，那只有靠自己的一个‘诚’字，日久天长，自能潜移默化了。”“倘我以诚待人，而人对我仍存戒心者，则首先应反省自己，看诚的（今天为“得”——编者注）够不够，诚之功夫用得到家不到家？”

与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彭雪枫也有方法和态度，“则应于诚字之外，再加上一个耐字……即不要片面的（地）去认识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短亦有其长，有其恶亦有其善，倘能耐心与之接近与之畅叙，必可发现其优点长处……”

彭雪枫关爱战士们，也得到了战士们们的爱。“在指挥阵地上，看着战士们那种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雄姿，使我深为感动，为了执行命令而毫不吝惜自己的鲜血，我从内心（的）④热爱着他们！也许他们也在爱着我吧。”

秉持这些做人做事原则的彭雪枫，牺牲于1944年9月的八里庄战役，五个月后，党中央在延安和淮北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万民痛哭。追悼会后不久，春节来临，军民们将他的画像贴在堂屋正中的墙上，相互拜年时，不约而同对他鞠躬行礼，乡亲们表演传统节目，如狮子、龙灯等，也首先到他的墓地，为他表演。正如陈毅同志在《哭彭八首》诗中所言：“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

从1941年9月到1944年7月间，彭雪枫给妻子林颖写了80多封信。彭雪枫牺牲40多年后，林颖将这些信件整理成《彭雪枫家书》出版，公之于众，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文韬武略、做人风范和治军风范。

备注：文中①②③④为原文

从东魏造像到跨海重逢

李 进



【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名列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西南40公里处天龙山腰。石窟共分四期开凿，始凿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石窟25洞，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间。其中唐代石窟最多，共15洞。天龙山石窟有许多早期建筑实物资料，其高超的雕造技法是石窟这种外来艺术逐渐中国化的典型实例。



天龙山石窟（资料图片）

1934年秋，天龙山漫山红叶如血。第21窟唐代胁侍菩萨的面容在钢凿下破碎时，山间忽然卷起奇异旋风，将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的相机掀落悬崖。这个在当地流传至今的“菩萨怒”传说，在2020年9月佛首回归之夜重现——当装有唐代佛首的文物箱缓缓开启，天龙山突降甘霖，雨水沿着千年摩崖，缓缓划出道道水痕。

青石上的永恒微笑

公元534年至550年，北魏王朝分裂的烽烟中，高欢在晋阳城西的天龙山开凿首个石窟。第2窟北壁的“宝冠释迦佛”，保留着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最神秘的微笑：唇线比云冈石窟缩短2毫米，眼睑弧度增加5度，这种突破性的“东魏样式”使石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亲和力。

2016年，考古工作者清理第10窟积土时，在莲花座底部发现墨书题记“大魏武定三年，青州匠人法净造”。这位史籍未载的匠师，用独创的“阶梯式开脸法”解决了砂岩易崩裂的难题——先雕出面部轮廓，待石料自然干燥3年后再精修五官。如今我们凝视这些佛像，仍能看见当年匠人在石面上留下的精细修整痕迹。

盛唐气象的巅峰绝唱

唐高宗龙朔年间，长安画师宋法智带来的“于阗粉

本”点燃了天龙山造像革命。第14窟的弥勒佛衣褶如微波荡漾，这种被称为“曹衣出水”的薄衣贴体技法，在长安石窟中需用细腻的大理石呈现，而天龙山匠人竟在粗粝的砂岩上实现了更高境界——通过控制凿击角度，让45度斜向纹理产生丝绸般的视觉幻象。

最令人惊叹的是石窟里的唐代力士像。2019年，经三维扫描显示，其膨胀的肌肉线条完全符合现代人体工程学：右臂肱二头肌的岩石密度比左臂高15%，这种精准的物理配重使悬空探出的降魔杵历经千年不曾断裂。当地至今流传着“鲁班化身游方匠人，夜半以月光淬炼鳌子”的传说，而科学检测揭示真相——唐代工匠掌握了用榆皮汁混合石英砂的独家研磨剂，使工具硬度提升了3倍。

跨越世纪的凝望

1924年，第9窟露天大佛留下的影像，成为它最后的完整踪影。1948年，梁思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天龙山佛首时，在日记里写道：“石像的眼窝里积着异国的灰尘，比故乡的风沙更刺痛人心。”

2020年回归的第8窟北壁佛首，面部残留的贴金痕迹与石窟本体检测结果完全吻合。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显示，其金箔纯度达到98.7%，与唐代太原府“并州金”文献记载一致，耳垂处的朱砂涂层更是与《历代名画记》中“天宝年间，并州造像始用辰砂点睛”的记载相互印

证。当佛首与石窟残存的颈部断面实现毫米级吻合时，数字化复原显示其微笑弧度恰好与窟顶莲花藻井形成完美映射。

石壁上的文明基因

天龙山现存25窟中，有129处“镜像开窟”现象：早期窟门的火焰纹总会对应晚期窟顶的莲花纹，唐代菩萨的璎珞间隙必定藏着前朝供养人的姓氏缩写。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在2023年春天绽放新枝——文物修复师用穹顶投影技术，让流散全球的23尊造像以光影形式“归位”。当第21窟在数字世界中重圆时，人们发现菩萨飘带末端指向的位置，正是1934年山中定次郎相机坠落的深谷。

暮色中的天龙山，晚风掠过空荡的佛龛。那些残缺的石壁上，北魏的苍劲与盛唐的雍容仍在进行着永不完结的对话。第9窟大佛掌心向外，千年未变的姿态仿佛在等待：当最后一位游子归家时，所有流落的时光都将在砂岩的纹路里找到答案。



“国保”背后的故事

（13）

南禅奇的“三史三最”

王晓东



南禅寺佛像雕塑（部分）（资料图片）

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的设计灵感多数来源于我国各地古代建筑，这使得其不仅是一款游戏作品，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游戏中，山西古建筑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桎梏，不仅展现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还为游戏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游戏取景地之一的五台县南禅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唐代建筑的标本”，自1953年被发现便声名鹊起，其历史文化价值，可以“三史三最”概之。

中国建筑史上的最早

南禅寺大殿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大殿唐风显著，殿顶舒展平缓，屋顶坡度是1比5.15，是已知中国木构建筑中最平缓的，且出檐深远舒展，尽显唐建的疏朗大气。大殿12根檐柱中，西侧3根为方形柱，祁英涛、柴泽俊先生《南禅寺修复》一文中认为，从木质风化程度及制作手法判断，方柱的年代比圆柱还要早，很可能是南禅寺创建时的遗构。已知时代最早的方柱遗痕为咸阳秦国宫殿遗址，如西安西郊汉代遗址中，所有柱子都是方形。

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殿外貌与1953年发现时是有很大的变化的。1953年，山西文管会和中央社管局文物整理委员会专家组前往五台县了解五台佛光寺的修缮情况，得知南禅寺大殿的情况后，前往现场进行勘察测绘和综合分析，特别是在大殿的梁上发现“因旧名皆（时）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戌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的题记，确认南禅寺大殿是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由于建筑严重残损，专家组祁英涛先生于1954年提交了勘察报告和修复草案，经过近20年的反复论证，1972年，南禅寺大殿维修工程动工，1975年完成。工程采用“落架重修”的方式，执行了“唐式复原”的维修思路：一是在维修工程中，清理出了建筑原始台明，再按照营造法式从台明与出檐的关系中推算出檐长度，对檐长实施了加长；二是隋唐时期的实物和壁画中大多情况下只使用了大叉手而没有侏儒柱，维修中发现侏儒柱一组构件并没有与大叉手进行榫卯连接，去掉了这一历史上的“加固”痕迹；三是前檐门窗参照佛光寺改造；四是瓦饰“鸱尾”选择参照渤海国上京的鸱尾式样。大殿其他构件的维修尽量保存原有构件，采用了铁箍、钢管柱拼合、环氧树脂灌缝的等修补和加强方法，使得大部分原构件得以保存。

中国雕塑史上的最早

南禅寺大殿的佛像雕塑是中国内地目前所

知塑绘年代最早的一坛泥质彩绘造像遗存。佛殿重建时间为唐建中三年（782），故推测殿内现存唐代造像塑置时间亦应在这一年。但之后，根据现存墨书及碑刻，此殿建筑及塑像可能进行过多次维护修葺：宋元祐元年（1086），大殿东缝大梁底皮下，现可辨清的墨书题记为“维岁次丙寅元祐元年三月十一日竖柱檁枋……”；元至正三年（1343），大殿东缝大梁东侧悬挂一木匾，上有“收藏……文殊普贤……至正三年……”字样；明嘉庆之前和明万历九年（1581），现存《古刹新建净业绘帙十王设会立碑记》刻文中可知，此期间对该寺殿宇、钟楼、僧舍等建筑有过重修，新建净业殿三间，绘帙十王图一堂，有可能亦对寺内大佛殿塑像做过必要的整葺补装；《南禅寺重修圆觉庵碑记》《补修南禅寺碑记》《重修诸殿碑记》记载，清代曾多次修葺寺内佛殿等建筑，在对寺内殿宇修葺彩绘同时，亦对殿内塑像有过一定程度的补塑补装。

南禅寺佛像雕塑极具唐代雕塑艺术的风格。明显的特点是人体造型丰满，脸型丰满圆厚。胸部向外扩张，佛像站姿采取S形站立姿势，优美生动，服饰潇洒，上身袒露，双脚光赤，衣纹采取水衣纹，衣服紧贴肢体，增加了人体线条柔美，并大量应用飘带，增加动感，皆为唐代佛像雕塑显著特点，与敦煌唐代佛像雕塑风格相似。与南北朝佛像雕塑盖碗式佛首、脸部瘦削、面目清癯高颧等特点形成鲜明对比。而后世宋金的佛像风格，造型上更加追求真实感和生活气息，世俗化明显，佛像通常面容丰满，衣饰飘带流畅自然，整体给人以庄重秀美的感觉，相比较而言，唐塑更多些神性。

中国佛教史上的最早

崔元和《五台山南禅寺唐代造像稽考与解读》中认为，寺中佛像是“中国内地制作时间最早和表现内容最为丰富完整的一坛‘华严三圣’及《华严》像教造像”。

殿内原有唐建中年间重建时的彩塑17身，现存14身。主尊造像为“华严三圣”，盛唐最为流行。主尊为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像——毗卢遮那佛，身旁两弟子，两胁侍菩萨，身前两尊莲座上原各有一供养菩萨。左侧为普贤菩萨像，身前牵象者为黑面卷发上半身裸露的毘蓝奴。佛坛左右两端各有一天王像一尊。右侧文殊菩萨像，驭狮者为头戴风帽、足踏长靴、腰系战袍的胡人形象，该形象为于阗王，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新样文殊”塑像组合，文殊菩萨外着螺旋纹胸甲和腹甲，表情严肃刚毅，为“护国文殊”造型。文殊菩萨像前侧塑善财童子像，合掌躬身，侧耳倾听，既面对骑狮文殊，又面对胁侍菩萨。崔元和认为，这是《华严经》所述“五十三参”故事中，善财童子听从文殊菩萨教诲，去拜谒迦叶太子生母摩耶夫人的情节，彩塑通过“像教”形式，对《华严经》主要内容作了形象化的诠释和弘传，“此坛造像在题材内容和样式格局上，与唐代五台山密宗护国道场也存在密切关系……为后人认识和研究中唐之际五台山及中原地区的华严造像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南禅寺在历史上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庙，旧志《五台县志》《清凉山志》等文献中均无记载，大殿重修六十年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敕灭佛，限期拆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拆毁招提兰若（民间小庙）四万座，会昌毁佛以前的木构建筑物，有确切年代的只有此处。

或许，正是南禅寺微名不彰，方能偏安一隅，历经千年风雨，终得幸存。

贪泉泉自贪，
不饮不相干。
清源源自清，
即饮亦何凭。
居官洁己性天成，
不向旁寻峻峻名。
爱此原田滋地液，
昼夜催生送好声。
自是水滨无所问，
沧浪止许濯吾缨。

——明·祝徽《晋泉》

祝徽，江西临川（今江西钟岭）人，曾巡按山西。

晋泉即晋祠难老泉，为“晋阳第一泉”，泉水清冽，长流不竭。惟因此泉，晋祠周围的千顷良田得以灌溉，造就了“千家灌禾稻，满目江南田”的丰饶景象。诗人祝徽在本诗中，围绕晋泉的观赏性和功能性结构全篇，由此突出晋泉的不同流俗与不负盛名。贪泉自贪，清源自清，饮者亦不因所饮泉水而转移秉性，自成一体，各有各的圆融自在，各有各的天性所成。由泉及人，身为巡按御史的祝福以此自树并警人，实多几分言外之意。与此同时，诗人借晋泉一脉指向三晋一地，源远流长的同时也意味着承古续今，晋泉就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泉之清冽与人之廉洁浩浩汤汤，相互激荡。

晋地苦寒，水稻并非大面积种植物，晋祠周围得赖晋泉可享江南富饶之景，因此晋泉在富有观赏性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具备了灌溉价值，“爱此原田滋地液，昼夜催生送好声”可谓全诗中心所在。晋泉在具备文人趣味和精神寄托之外，亦未失本来功能，在更大意义上超脱出清浊之辨，成为与晋地人民休戚与共的生活景观。

到此为止，诗人祝徽完成了对晋泉内在意义和外在功能的双重挖掘，借由对晋泉的发挥，诗人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之所向。沿着“水滨”“沧浪”“濯吾缨”可溯至千余年前屈原与渔夫在江潭泽畔的千古之问，如何求解这一难题显然是包括诗人在内的历代士夫无可回避的人生之问。究竟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还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诗人祝徽以“自是水滨无所问，沧浪止许濯吾缨”一句交出自己的答卷，坚持“身之察察”与“皓皓之白”，而毫不理会“物之汶汶”与“世俗之尘埃”，在两种选择之中辟出第三条道路，既不舍生取义，亦非同流合污，保持自身之性便是由晋泉而来的立身之义。

该诗言简意赅，旨意委婉，余味不尽，在相当有限的篇幅中容纳了重大的人生之问，勾连历史与现实，匠心独运，尽显士大夫独立之思与关怀民瘼之情。在形式体制上，五、七言并具，在随意为之、不拘格律的背后，更见其潇洒怀抱与衷心所在。



特意锦绣太原

（49）

一泓清泉映古今

曹前

扫码看视频

